

# 古代谋和智慧

中国历史出版社

编著：颜林

书号：ISBN 7 - 6374 - 9311 - 3

电子版定价：4.00 元

版本：2003 年 6 月第 1 版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011 号

## 目录

交往不慎终致祸  
先纵后擒  
石碣灭亲  
如此用民  
焚烧盟书  
臧武仲不治盗贼  
晏婴智杀三士  
正话反说  
巧借物价省刑罚  
恭维中的劝谏  
秦襄王绝爱民之道  
魏武侯任才强国  
邹忌劝威王  
论剑藏玄机  
范雎议逐四贵  
刘邦论成败  
娄敬献策迁都  
伪游云梦擒韩信  
巧用名人保太子  
萧何诱杀韩信  
酈商智护功臣  
曹参为政  
将相和，吕氏亡  
立子杀母  
辅政诛叛逆  
龚遂治盗  
以诈治奸  
智谏刘秀  
行礼除暴  
廉范治蜀  
朱晖称病  
智斗窦景  
任棠劝太守  
虞诩不弃凉州  
虞诩治朝歌  
张纲治广陵  
贾琮对症下药  
羊续微服采风  
仇览教化陈元  
割发代首  
依法办事得人心  
温峤矫情脱险

杀一儆百  
以法治乱  
谢安处乱不惊  
计杀诸葛长民  
广施怀柔平内乱  
远虑无忧  
徐羨之得助废少帝  
陆倕料事如神  
公主掷衣救儿  
源贺上书减刑  
智借神灵诛劫匪  
人短智高  
恩威并施除匪患  
以贼治偷  
智化干戈为玉帛  
以退为进巧迁都  
百姓垂泪送刺史  
李膺以宽治蜀  
萧秀以安民为本  
杨逸放粮救万民  
欲擒故纵诛叛逆  
杨尚希上表减郡  
柳昂劝学行礼  
杨坚智定内乱  
薛道衡纵论陈朝得失  
巧解《论语》论治国  
唐太宗不计前嫌  
唯依功绩行封赏

## 序言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人好“斗”。此说不无道理，但有失偏颇。历史上，除了“斗”之外，中国人还谋求“和”。从某种意义上讲，“和”是贤者仁人所追求的境界。

儒家有句名言：“和为贵。”

兵家有个理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治家者有条经验：“家和万事兴。”

经商者有个信条：“和气生财。”

然而，社会是个复杂的肌体，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由于种种原因，难免产生种种不和，不和就要分歧，分歧导致摩擦，摩擦导致矛盾，矛盾导致争斗。

可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关键在于谋求人和。谋和需要有胸怀。尽人皆知的战国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和”，就是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宽大胸怀而赢得的。

谋和需要有策略。东汉时，贾覆与寇恂因事而起矛盾，使起武人的性子，偏要与寇恂以武力分个高低。而寇恂知道后，巧妙地以一顿酒饭“化干戈为玉帛”。

谋和需要有见识。何种事物可谋和，何种矛盾可谋和，何种人物可谋和都要有个准确的分析与估计，否则，谋和不成反被人谋。东郭先生和狼的寓言故事，可为谋和者戒。

谋和对于我们今天也是很有必要的，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人们才会感到温暖；有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人们才会感到舒畅；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人们才会安心建设；有一个祥和的气氛，人们才会感到人世的温馨。人和有排山倒海的力量；人和是事业成功的前提；人和是经济建设成功的保障。

## 交往不慎终致祸

范蠡是春秋争霸时期的智者，他能够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20 余年，灭吴而归；又清醒地全身而退，躲过勾践指向功臣的屠刀，实在是那个血雨腥风的现实有超过常人的深刻认识。思想认识可以指导生活实践，所以范蠡弃官经商，同样成功，富能敌国，世称“陶朱公”，比那些诸侯国君毫不逊色。只是思想认识只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实践，从父母那里可以继承钱财，并不能继承到人生智慧。

于是，陶朱公范蠡的儿子便演出了一场弄巧成拙的历史闹剧。

越王勾践二十四年(前 473 年)，越大夫范蠡等人侍奉越王勾践，苦身戮力 20 余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转弱为强，于是年大破吴师，迫使吴王夫差自杀。范蠡因功被封为上将军，倍受各国诸侯青睐。范蠡却认为“威名之下，难以久居。”又看出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遂乘船浮海出走，北上入齐，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父子治理产业，勤奋努力，不久便积财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认为久享尊名，不祥。遂归相印，迁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以计然富国之策经商，终富埒诸侯，世称“陶朱公”。

朱公居陶，喜得少子，少子长到壮年，朱公的二儿子杀人犯罪，被囚禁于楚国。朱公闻听，言道：“杀人抵命，理所应当。然我听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便令他的小儿子到楚国去探望，临行时，小儿子带了一千镒黄金，置于粗布袋中，并用一辆牛车装载布袋。小儿子将要上路，朱公的大儿子也执意要去，百般央告，朱公就是不答应。大儿子十分不悦，对朱公道：“长子职责，名为‘家督’，如今二弟犯罪，父亲不派长子去探望，偏偏派小弟弟去，就等于是责我不贤了。”言罢，声泪俱下，就要自杀。其母见状，亦向朱公为长子讲情道：“夫君仅派少子前往，是否能救活二儿子，还未可知，如今又要白白地死了大儿子，如何是好？”朱公无奈，只好派大儿子也去探望，并写信一封令其长子携带，要大儿子至楚后务将信先交给他的老朋友庄先生。临行时，朱公反复叮嘱长子道：“到了那里，一定要将千镒黄金送到庄先生家中，任凭他来处置，凡事悉听庄先生，千万不要和他争辩。”

大儿子到了楚国，找到了庄先生的家。只见庄先生家境贫寒，室内并无任何豪华的陈设，唯有几件简陋的生活用具而已。几间破旧的房屋靠近外城，前面是一大片野菜地。当地居民皆为贫民，并无一家富户，是都城附近的一处贫民窟。大儿子见状，心中有些犹豫，对请庄先生帮助救活二弟之事表示怀疑。但出于父命，大儿子还是拿出朱公的信及千金送与庄先生。庄先生收下千金，看完信，便对朱公大儿子说道：“你可以走了，不要在这里停留，如令弟果真被赦免出狱，也不要再去追根问底”；大儿子告别庄先生出来，并未返回陶地，也不相信庄先生真有回天之力，挽救二弟一命。遂又用私自带出来的黄金，去贿赂楚国的一些权贵。庄先生虽然住在贫民窟中，却是安贫乐道的高士。他为人清廉，忠信正直，闻名于楚国。楚王及群臣，各地来楚的读书人，都非常尊重他，把他当作传业授道的老师，他之所以收下朱公大儿子送来的千金，并不是有意接受，只不过将千金视为信物罢了，准备将事情办妥后再送还给朱公。当朱公的大儿子走后，他便对自己的妻子道：“这是朱公的黄金，如果我生病去世，你务必记着日后归还于他。”

庄先生选择个适当时机进宫去会见楚王，对楚王道：“昨晚我观星相，见天上有的星星移动了往常的位置，恐怕对楚国不利。”楚王历来尊重庄先生，便问道：“如今该怎么办呢？”庄先生答道：“只有兴德政，行善事，才可以消除。”楚王道：“先生您休息去吧！寡人立即照办。”于是，楚王便派遣使者封闭了储存金、银、铜；钱的库房。楚国受贿的权贵们得知消息，忙派人告诉朱公的大儿子道：“国王就要大赦，令弟可以得救了。”朱公的大儿子问道：“何以见得？”使者答道：“楚王每次大赦，都要封闭储存三钱之库。昨夜，三钱之库已被楚王下令封闭。”大儿子不知楚王大赦，实出于庄先生之谋，私自忖道：“既已大赦，二弟自

当释放，枉送千金与庄先生，毫无意义，不如索回。”于是，大儿子又去见庄先生。庄先生见他到来，非常惊讶，问道：“你还没有走吗？”大儿子道：“是的。当初是为了二弟之事来见庄先生，如今听说就要大赦，二弟自当释放，故来向先生辞行。”庄先生知其来意，微微一笑道：“既然令弟即将释放，那千金你还是取走吧！”大儿子并不谦让，挺身进屋将黄金携带而出，昂然而去。

庄先生被小儿辈耍弄一番，觉得非常难堪，认为：不讲信义之人，不值得帮助。便再次入宫去见楚王，对楚王道：“君王大赦天下，以德回报是星辰移位之事，自然再好不过。可是，我在外面，闻听陶地的富豪朱公之子杀了人，现囚禁在楚国，他家用很多金钱来贿赂君王身边的人，所以，外面纷纷传说君王并不是体恤楚国百姓而实行大赦，实际上是为了朱公之子。”楚王闻言大怒道：“寡人虽然不德，又怎能为朱公之子而实行大赦呢？”遂下令将朱公之子斩首。朱公之子死后的第二天，楚王方正式下达赦令。朱公的大儿子只得带着二弟的尸首返回家中。

他们的母亲和邻里都很悲痛。只有朱公知道其中原委，喟然长叹道：“我本来就知道大儿子如去二儿必死，所以才不令其至楚。大儿非不爱其弟，只是吝惜钱财，不晓人之处世交往之道。庄先生乃义士，何看重金钱，不过气恼大儿不讲信义罢了。大儿自幼与我一起受苦，知谋生不易，所以不轻易使财，故失信义于人。至于家中小儿，生长于富有之时，只知乘华车，骑骏马，逐野兔，不知钱财来之不易，平时大手大脚，不吝惜钱财。所以，我才执意要派小儿子前去。小儿子能办到的事，大儿子却办不到，结果使二子被杀，此乃事之常理，不值得悲痛。我本来就日夜等待丧信的到来呀！”

人之处世交往，须重信义，不可反复无常。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重财轻义，刻薄待人，必失于友，为人所唾弃。朱公大儿之事，当为一鉴。

### 【简评】

求人办事，自然有一个如何对待人的问题。或者以礼待人，或者以理服人，或者以貌取人，或者以情动人，或者以利诱人，或者以势压人，或者以法治人。

这样多的办法，不可能全部使用，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

陶朱公范蠡历尽沧桑，对庄先生的价值自然认识得很清楚，所以要叮嘱儿子一切听庄先生的，甚至送千金表示尊重。

朱公子没有处世经验，只能以貌取人，以庄先生家境贫寒为由自作聪明，结果是因小失大，误了兄弟的性命，而且失信于人，实在是遗世笑柄。

处事首先在于待人，这种历史教训应该记取。

## 先纵后擒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是一条暂作让步、待机而动、后发制人的谋略。它不仅运用于军事活动中，在政治角逐场上也见其功力。

如果一味逞强，以刚制刚，有时会适得其反，不如先采取忍让的策略，用小惠一步步将敌手引进自己设下的圈套，待时机成熟，再果断出击，将其一网打尽。

古往今来，以此道对付敌人的例子不胜枚举。下面就讲一则先纵后擒的事例。

春秋时期，郑国的郑武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寤生，即后来的郑庄公，另一个叫共叔段。郑武公的妻子姓姜，寤生和共叔段虽然都是她的亲生儿子，但她却有亲有疏，只喜欢共叔段，而不喜欢寤生。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只因为寤生出生时是难产，让姜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所以，郑武公在世时，姜氏多次提出要立共叔段为太子。然而立长不立幼是当时定制，郑武公始终没有同意。

郑武公死，寤生继位，即郑庄公。姜氏见所爱的儿子继位不行，便向庄公提出以制(今河南荥阳)这个地方作为共叔段的封地。庄公没有同意，他说：“制那个地方太险要了，想当初虢叔就死在那里。除了制，为共叔段选什么地方都行。”姜氏为共叔段选制地，其目的就是让共叔段远离庄公，好为所欲为。她见制地要不下来，便为共叔段改请京城。京城在制东南 20 余里，让共叔段封在那里，其意义也和封在制差不多。庄公因有除制以外任选一地的许诺，便答应了。

共叔段在姜氏的庇护下，一到京城，便开始准备夺取哥哥的王位。首先，他把京城加以扩大。郑国大夫祭仲看到苗头不对，便对郑庄公说：“国家对于城邑的规模是有严格规定的，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邑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的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规定，这对国家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您不可不防。”郑庄公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京城是母后为共叔段要的，我怎能对他加以限制呢？”祭仲说：“姜氏决不会满足于让共叔段扩建城邑的。扩建城邑后他还会有新的举动。您应当及早采取防范措施，作适当的安排。否则，等共叔段的势力发展起来，您就不好对付了。您没听说过草蔓难除这句话吗？野草蔓延开来尚且难除，何况您受宠爱的兄弟呢！”庄公说：“一个人不义之事做多了，必然会倒霉。我们看着他怎样发展吧。”

过了些日子，共叔段见自己扩城之事无人过问，胆子更大了，他下令让西部和北部的边境之民都服从自己的命令。大夫公子吕找到庄公对他说：“现在国家实际上出了两个君王，分别着两种命令，指挥着两地的臣民。您作为一个君主，怎能容忍这种情况呢？您是不是拿他没办法呢？如果真是这样，干脆就把君主之位让于共叔段，我就名正言顺地去侍奉他。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请您把他除掉，不要让百姓对您怀有二心。”郑庄公说：“别着急，用不着我去除他，他会自取祸殃。”

又付了些日子，共叔段见庄公还没有动静，便越发胆大了，干脆宣布郑国的西部、北部边境为自己的封地，并把封地扩展到了廩延(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公子吕又找到庄公，对他说：“我们应该动手了。否则，等共叔段势力雄厚时，民心就会归顺于他了。”郑庄公仍不同意出兵，他说：“不义之举，怎能取得民心？让他发展势力吧，到一定程度他就会分崩离析。”

共叔段见自己的图谋步步得逞，就开始修整城池，积聚粮食，制造武器，武装步兵车兵，准备进攻郑国的首都。姜氏则准备到时为共叔段打开城门，作为内应。

郑庄公并非对共叔段置之不理，他派人暗地监视共叔段的一举一动。当他听到共叔段起兵的具体日期时，便对公子吕说：“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便命令公子吕率大军去京城讨伐共叔段。京城的人听说国王派军前来，纷纷倒戈，共叔段成了孤家寡人，便弃城而逃。

### 【简评】

“多行不义，必自毙”，自作自受，本无话可说。但郑庄公一类的人物也的确“城府”太深了！用利害，用纵容，甚至故意显示“软弱”来制敌于“不义”的境地，表面上唯唯诺诺，骨子里却是“看你横行能几时”，然后自己再去充当正义的化身，替天行道，使本来十分卑劣的目的穿上堂皇的外衣，不足为人道的手段成为智慧的体现。

三国时孙权力劝曹操废汉自立，当皇帝算了。曹操不为所动，一笑置之说：“你这是想把我放在炉上烤啊！”终于没有做皇帝。曹操不愧是个“奸雄”，也成就了大事。近代则出了一个北洋军阀段祺瑞，他挑动张勋复辟，把黎元洪赶下台，自己却“马厂誓师”，赢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可终究只是个短命的“皇帝”。

因此，谁要是不顾公义、违背常理地放纵你干坏事，那一定是不怀好意，切不可掉以轻心！

## 石碓灭亲

“借刀杀人”，属于三十六计的一计，本是统治者之间相互利用、尔虞我诈的一种政治权术，后来演变为被人所熟知的军事谋略。

它主要是利用借助第三者和外部力量，来削弱自己敌人的势力，或干脆将其除掉。此计用途广泛，但为何而“借”，怎样去“借”，却意义大为不同。用于阴谋害人者，有之；用于除恶扬善者，也有之，不能一概而论。不信，请看下例。

石碓是春秋时卫国的大夫。石碓任大夫时，卫国正是卫庄公在位。卫庄公的妻子名叫庄姜，是齐国国君的女儿。庄姜生得姿质艳丽，倾国倾城，但始终未能给庄公生孩子。庄公为传宗继位，便又在陈国娶妻名叫厉妫，生了孝伯，但不久又夭亡。后来，厉妫的妹妹戴妫又为庄公生了儿子，取名为完。以后，庄公的妃子们又为他生了其他的儿子。而庄姜很爱完，便将他作为自己的儿子。

庄公的一个儿子名叫州吁，是一个宠妃所生，很受庄公的宠爱，但庄姜很不喜欢他。石碓便对庄公说：“怎样才算是真正喜欢孩子呢？我认为应当教育他懂得道义，不走邪路。怎样才能不走邪路？就是不要对孩子偏宠、溺爱。偏宠、溺爱，就会使孩子傲慢、无礼、犯法、放荡，就会走上邪路。孩子受宠就会骄傲，骄傲就会对自己地位下降不安心，不安心就会导致怨恨，怨恨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现在州吁就处在这个地位上。他很受您的宠爱，您却不能对他严加管教。而庄姜王后却不喜欢他，一旦他地位下降，就会酿成祸乱。如果您准备立州吁为太子，那就赶快定下来，如果总定不下来，祸患迟早就会发生。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全力除去隐患，总不该不除隐患，反而加速它的爆发吧！”

庄公对石碓这番苦口婆心的劝告一点也听不进去。

石碓见劝说无用，知道州吁早晚要危害卫国，便去管教自己的儿子石厚。因为石厚和州吁关系很好。但石厚不但不听，反而和州吁更加亲近。

卫庄公死后，国内果然出了乱子。庄姜的儿子完继位，为卫桓公。但不久，州吁便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

州吁自立为国君后，国内局势非常不稳，很多人都对他的统治不满。为了转移国内百姓的视线，他利用宋国和郑国的矛盾联合宋国、陈国、蔡国共同攻打郑国。当时鲁国人众仲就预见到州吁一定会失败，他说：“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又挑起战争，使百姓饱受战争之苦。一个人不是靠自己的美德去赢得百姓，反而想通过战乱取得成功，是一定要失败的。”

果然，战争并没有挽救卫国的政治危机，国内百姓反对州吁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州吁为了稳定其统治地位，便让石厚向石碓请教安定君位的办法。石碓早就想除掉这两个祸国殃民的家伙，他见石厚前来询问自己，便想出了一个计策。他对儿子石厚说：“如今各诸侯国虽已纷纷各自为政，但周朝天子还有他的虚名，因此，可以利用朝拜周天子办法取得州吁的合法地位。”

石厚问：“怎样才能去朝拜周天子呢？”

石碓说：“现在陈国的国主陈桓公正受着周天子的宠信，而陈国又与卫国相好。如果你带着州吁去拜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周天子，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石厚听了非常高兴，于是便跟着州吁去陈国。不料石碓早就派人先到了陈国，对陈桓公说：“我卫国是个小国，而我年事已高，有心为国除害，但已力不从心。州吁、石厚这两个人，确实是杀害君王、篡夺君位的贼子，希望您能借机帮助我们除掉他们。”陈桓公答应了。

石厚、州吁一到陈国，便被陈国逮捕起来。接着，陈桓公便派人去卫国，请卫国派人前来处置他们。卫国便派来两个人将石厚、州吁分别杀死。

【简评】

看来，“借”字大有学问，蕴藏难以说尽的丰富含义。“杀人”固然有正义和邪恶之分，而“借”只是一种智谋手段而已。

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围困魏地樊城、襄阳，曹操很是惊恐，要迁都以避关羽的威胁。司马懿和蒋济却不以为然，劝曹操说：刘备、孙权表面上是亲戚，骨子里是疏远的，关羽得志，孙权是不乐意的，可派人劝孙权攻击关羽的后方。曹操采纳了二人的建议，吴军果然愿意与魏军联合攻打关羽，终导致关羽败走麦城，被吴国兵士所擒。

这种“杀人”之术，只是军事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而用于某种政治目的，就没有这么简单了。石碯假借陈国之手除掉卫国的祸害，便带有为国家安定着想的积极意义，而所诛之人中，又有一个是他的亲生儿子，自然称得是“大义灭亲”之举，令人由衷地佩服。可见，有智有识，才不愧谋略家的美称。

## 如此用民

信、义、礼是古代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是当时人们借以判断是非的精神文明的尺度。儒家干脆把“仁、智、礼、义、信”，作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最高的道德规范，而归根结底，还是以“忠”为核心的。

何谓强国？如何致强？春秋时代百家争鸣，所提出的治国安邦之策很多，而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公元前636年，晋公子重耳结束了在外国流亡的生活，回到了晋国，作了国君。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回国后，就开始训练他的百姓。两年以后，晋文公认为差不多了，便准备用其百姓称霸诸侯。大臣子犯劝阻说：“百姓虽经过训练，但还不懂得义，还没能各安其位，不能用。”

晋文公觉得有理，他便想办法让百姓懂得义。正在这时，周朝发生了“昭叔之难”。昭叔是周惠王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惠后。昭叔还有个哥哥，是太子，即后来的周襄王。惠后想立昭叔为太子，但还没得逞便死亡。昭叔便逃到齐国。襄王即位后，将昭叔接回来。然而昭叔回国后，又和襄王之后狄隗乱搞。襄王知道后，便将狄隗废掉。这下触怒了狄隗的娘家，他们派兵讨伐周朝，周襄王便逃到了郑国。周朝在当时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宗主，晋文公决定帮助周襄王返回周朝主政，并用此事教育晋国的百姓什么是义。他派出左右二军，右军攻杀昭叔，左军往郑国迎接周襄王返国。周襄王为表彰晋文公的功劳，待之以礼。晋文公推辞说：“这是臣下份内之事。”晋文公用行动告诉百姓对上尽忠就是义。他帮助襄王返国后，又回国致力于便利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他认为这下可以使用其百姓了。

不料，子犯又出来阻拦，他对晋文公说：“百姓虽然懂得了义，但还不知道信是怎么回事，还不能。”

于是，晋文公又想方设法让百姓懂得信。他率领军队攻打原国，命令士兵们携带三天的口粮。军队围困原国城池整整三天，士兵们的粮食全部吃完了，而原国还未投降。晋文公就下令退兵。正当晋军刚退兵时，派出的间谍从城里出来报告说：“原国已经支持不住，准备投降了。”有人主张再坚持一下，等待原国投降。晋文公说：“当初带三天军粮，就是准备攻打三天，如今已下令退兵，就应该说话算数。如果不退兵，虽得原国而失去信用，百姓也就失去庇护。得失相比哪个多呢？”由于晋文公利用打原国教育百姓知道信，所以国内民风大变，凡事以信为本，他们作买卖不求暴利，交易分明，不贪不骗。

作到这些后，晋文公又问子犯：“这回行了吧？”子犯回答：“还不行。百姓虽知信、义，还不知道礼，还没有养成恭敬的风范。”于是，晋文公又在让百姓知礼方面作了很多事情。他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每个环节都依照军礼执行，使百姓看到礼仪。又设立执秩之官

来规定百官的等级及职责，使百姓知道对什么职官行什么礼仪。百姓们不但如此，还知道根据礼来判断一件事的是非。这时，子犯才说：“民力可用矣！民心可用矣！”

于是，晋文公开始伐曹国，攻卫国，取得齐国之地，解救宋国之围，大败楚军于城濮(今山东范县境内)，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 【简评】

“春秋无义战”，是史家们对当时状况的评定。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春秋时代，所谓忠、信、礼等，只不过是操纵在统治者手里，或用来保护自己，或为彼此攻诘的武器而已。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虽时刻想着称霸之事，倒也还能从涑如流。子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其精心谋划。他认为这之做的目的无非是使民心、民力“可用”。用者，也不过是利用罢了。民对我，要知义、知信、知礼，才可任我摆布；而我对人，对周天子，对别的国家，却可“强权就是公理”，以力取胜。后来自“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始，孔夫子的“仁”、“礼”便成为以一贯之的思想。遗憾的是，却没有几个皇帝在争夺天下时能想得它们来。

如今，春秋时代称霸的行为与欲望，早已为人们所不齿、所唾弃，但谋求富强仍旧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当人们在努力使自己国家富强之时，又该如何对待晋文公与子犯他们的行为呢？

## 焚烧盟书

有时人的愿望尽可以无限美好，然而人的能力却不是无限大的。如果想象超越了现实，人的能力又无法达到，不仅会使希望破灭，而且要跌得头破血流。

因此，“力小任重则踣(跌倒)”，智者绝不作自不量力的事情，懂得顺时而谋，方可找到万全之策。

下面说的事例就很令人警醒。

公元前563年，郑国的子驷掌握国家大政时，子国任司马、子耳任司空、子孔任司徒。这年十月十四日，郑国发生了叛乱，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等率领叛乱分子攻入宫中，杀死子驷、子国、子耳，并劫持了郑国君主郑简公。子孔因事先对此事有所耳闻，所以幸免于难。

子驷的儿子子西听说发生了叛乱，赶紧入宫，收起他父亲的尸体，然后回家召集人马。但是他的家臣大多都已逃走。子国的儿子子产就不像子西那样，他听说有叛乱，便设置了守门的警卫，配备了所有的官员，关闭了档案库并加紧了防守。然后，子产又把士兵排列好，并准备了17辆战车，往北宫攻打叛乱分子。很快子产就平定了叛乱，杀死了尉止、子师仆。侯晋逃到了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逃亡到宋国。

这次叛乱过后，子孔便接替了子驷的位置，掌握了国家大政。他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便想办法集中权力。他制作了一份盟书，要求所有政府官员照盟宣誓，保证各守其位，听从他的号令。一时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大夫、官员，及他们的家臣都不乐意宣誓。子孔大怒，准备把那些不服从他的人全杀死。

子产听到这个消息，前来劝阻子孔不要这样做。他说：“既然大家对盟书有意见，不如把它烧了。”

子孔不同意，他对子产说：“我之所以要制定盟书，就是为了要使权力集中、国家安定。现在大伙一发怒，就把盟书烧掉，顺从大伙，这不成了大伙当政了吗？我怎样管理国家呢？”

子产说：“您现在面临两件难事。一是众怒难犯，二是个人专权极端困难。两件难事加在一起是难上加难，这不但不能使国家安定，反而会酿成更大的危险。不如烧掉盟书，使大

伙安定，国家才会安全。专权不会成功，触犯众怒会招致祸乱，这个道理请您仔细想想。”

子孔被子产说服了，便在仓门外烧掉了盟书，众官员们才安定下来。

### 【简评】

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企图靠一纸盟书来约束大家，太不现实了。因为服从是建立在价值观一致的基础上，只凭职位、权力的影响和强制性命令，是难以让人口服心服的。故真正有权威的领导者，懂得怎样将自己的主张内化为下属的价值观。

子产不愧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敏锐地看出了症结之所在，果断地劝子孔烧掉盟书以求得国家的安定。由此可见，国家不是靠某个人的美好愿望就能治理好的，而是依靠对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丰富的实际经验。

## 臧武仲不治盗贼

有些事情，听起来荒谬，细想起来却有道理。

庄子曾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意思是偷小东西有罪，偷大东西，像国家，就不会被治罪了。

春秋时臧武仲指责当政者把盗贼引入国家，听起来不可理解，但细想起来，有没有道理呢？

公元前 552 年，邾国人庶其背叛了他的国家投降了鲁国，并将邾国的起漆和闾丘两座城邑献给了鲁国。鲁国的当政者季武子很高兴，为了表彰庶其，把襄公的姑母嫁给他作妻子，并对他的所有随从都加以赏赐。

当时，臧武仲正任鲁国的司寇，掌管国家的狱讼和治安。他对季武子的所作所为有意见，便想找个机会提出来。

恰巧，鲁国的盗贼闹得很凶，臧武仲有意不治。季武子便找到臧武仲，问他：“盗贼闹得这样厉害，您为什么不去禁治？”臧武仲说：“盗贼可不能禁治。而且，我也没有能力去治。”

季武子感到奇怪，问：“我国四边都有边境，其作用之一就是用来禁治盗贼，如果盗贼不可以禁治，我们要边境和军队干什么？再说，您作为司寇，职责就是维护治安，惩治盗贼，怎么说没能力呢？”

臧武仲说：“不错，我的职责是禁治盗贼。但在我禁治盗贼的同时，我们国家有人却将外面的盗贼引进来，并且给予礼遇。有人让外面的盗贼进来，却让我治国内的盗贼，我怎么能治得了？”

季武子说：“谁这么大胆，敢引外面的盗贼进来？”

臧武仲说：“就是您呀！”

“什么？你把话说清楚！”季武子生气了。

“您先别急，”臧武仲说：“听说您给了邾国人庶其很优厚的待遇，是吗？”

“这和招引盗贼有什么关系呢？”

臧武仲说：“庶其在邾国，偷盗了国家的城邑，前来我国。您把国君的姑母给他作妻子，还赏给他城邑。不但如此，那些随从也被赐以车马、衣服、佩剑、带子。这些大大小小的盗贼都得到了赏赐。赏赐盗贼，又要去掉他，这恐怕是太困难了吧？我听说，处于高位之人，心灵要洁净，待人要专一，其一举一动都要符合法度而使人民信任，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上面的所作所为，对百姓的影响很大。上面遵守法度，而百姓有人不遵守，上面因此加以惩治，百姓哪个敢不警戒？如果上面乱来，百姓也跟着仿效，这是势所必然，谁又能禁止呢？”

季武子听了，再也无话可说了。

## 【简评】

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一般百姓讲，只有修身、齐家的份儿，与治国、平天下无关。但对于治国者，修身、齐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俗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基础不牢要垮台。”当政者身子不正，何以要求别人。臧武仲用不治盗贼的办法，告诫了季式子这个道理，您说，他是不是个治国的智者？

## 晏婴智杀三士

王充在《论衡》中说：“知为力。”知即智，意思是说智慧就是力量。

智用到大处，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以“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但用到小处，便可以导演出“二桃杀三士”之类的“杀人不见血”的活剧。

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在位)时，齐国三个勇士辅佐景公，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公孙接，另一个叫古冶子。三人力大无穷，武艺超凡，号称“齐邦三杰”。

时景公采纳晏子的建议，废除繁刑，打开仓廩贷粮给百姓，以利耕种，国人大悦。于是，齐景公开始往东扩张，东方诸侯各国纷纷臣服于齐国，成为齐国的属国，只有徐国等几个小国不服从齐国。景公便封勇士田开疆为将，率兵讨伐徐国。田开疆奋勇当先，斩杀了徐国的大将，俘虏了徐兵五百多人，吓得徐国连忙投降，就连附近的郟国(今山东郟城县)和莒国(今山东莒县)也都归顺了齐国。自此，齐国日益强盛，与当时的晋国一样称雄于诸侯。

另一个勇士古冶子，曾经跟随景公过黄河，途中遇见了一只大鼉，一口将景公的马咬住，并将马拖入水中。古冶子奋勇跳到水中，与大鼉搏斗，将其杀死，救出了景公的那匹马。

还有一个勇士公孙接，曾经跟随景公到桐山打猎，突然有一只猛虎向景公扑来。公孙接急忙从车上跃下，徒手勇斗猛虎，一顿拳脚，将猛虎打死，救了景公。

景公非常宠爱这三个人，不仅重重地嘉奖他们，甚至出入也常命这三人相随。这三个人在朝中挟功恃勇，粗暴野蛮，对朝中大臣傲慢无理。当晏子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向他们表示敬意时，他们非但不起身，连头也不抬。在齐景公面前，他们也常以你我相称，并无君臣之礼。

这三个人恃勇乱朝，破坏礼仪，已经成为国家的祸患。晏子便进宫劝谏景公说：“我听说，明君蓄养勇士，对上来说要有君臣道义，对下来说要有长、少伦常，对内来说可以禁止强暴，对外来说可以威慑敌人。国君认为他们的事业要对自己有利，人臣则佩服他们的勇敢，有功于朝廷，因而才提高他们的地位，增加他们的俸禄。如今，国君所蓄养的勇士，上没有君臣道义，下没有长、少伦常，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慑敌，这些人既危害国家，又不利于民生，不如及早除掉他们。”

景公回答说：“这三个人，搏斗恐怕斗不过他们，刺杀他们也恐怕不能成功。”晏子说：“这些人只知靠勇力击敌，不懂得长、幼之间的礼节，只可智取，不可力敌。”

于是，晏子请求景公派人送给他们三人两个桃子，请他们按照功劳大小分吃桃子，如果不能得到桃子，就算不得勇敢。

公孙接首先挺身而出，立于堂前说道：“我公孙接跟随主公狩猎，力诛猛虎，保驾有功，像我这样的功劳，可以得到一个桃子，不必与别人同吃一个了。”说罢，便随手拿起了一个桃子。使者赶忙令人进酒表示祝贺。

田开疆也接着嚷道：“我奉命讨伐徐国，拿起兵器打退了敌人的军队，像我田开疆这样的功劳，也可以吃到一个桃子，不必与别人同吃一个了。”说完，也拿起了一个桃子。使者亦令人进酒祝贺。

古冶子见状，连忙挺身向前说道：“我曾跟随主公横渡黄河，一只大鼉咬住了驾车的马，将马拖入河中，漂流到砥柱山的河中心，我不会游泳，只好潜到水底行走，向上游走了一百步，又向下游走了九里，才追上那只大鼉，将它杀死，我左手抓住马尾巴，右手提着大鼉的头，像鹤一样从水中飞跃而出，渡口上的人惊讶不已，一齐喊道：‘是河神。’定神一看，原来是那只大鼉的头。像我古冶子这样的功劳，完全可以吃到桃子，不必与别人同吃一个，你们二人为什么不把桃子放回原处！”说着，抽出宝剑就要厮杀。公孙接与田开疆听了十分惭愧，连忙说道：“我们的勇敢不如您，功劳比不上您，拿了桃子却不相让，是贪婪的表现，如果没有勇气去死，就算不得勇士。”于是，二人将桃子放回原处，拔剑自杀而死。

古冶子见二人自刭，亦惭愧得无地自容，说道：“他们二人自杀而亡，唯独我还活着，这是不仁的表现；用言语耻笑别人，并且夸耀自己的名声，是不义的表现；悔恨自己的行为，又不愿意去死，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如果他们二人还活着，同吃一桃是有所节制，我一人独吃一桃难道就是应该的吗？”说完也把桃子放回原处，自杀而死。

使者归报景公说：“他们三人都自杀而亡。”景公惋惜不已，命人以衣收殓了他们，以优厚的士的礼节埋葬了他们。

### 【简评】

晏子因三勇士恃强乱政，极力劝谏景公杀死三勇士。三勇士居功自傲，且无君臣之礼，如景公命令三勇士自杀，三勇士必然不服；派人杀死三勇士，三勇士勇力非凡，又不能成功。晏子便向景公献上一计，请景公赐二桃给三勇士，让三勇士论功分桃。三勇士开始各述其功，争执不下，后各自惭愧，认为争功不让的行为属于不仁不义，遂相继自杀身亡。

晏子知道三勇士重义轻生，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三勇士果中晏子之计，自惭而死。晏子以其智，制止了恃勇无礼，扰乱朝政的行为，维护了景公的威严，使景公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后人论及此事，有的赞赏晏子之智；有的则有微言，亦对三勇士之死表示惋惜。

## 恭维中的劝谏

说服，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古时候大臣想劝谏国君，尤为需要攻其心、动其情、晓之利害，施展各种劝说的招数。谁都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但“忠言”往往在尚未体现出利国利行之时，进言者却早已成了刀下之鬼，缘由就在于其言“逆耳”。

于是，有些聪明的大臣便会将“忠言”乔妆打扮一番，使其不那么刺耳，或责以大义、或寓贬于褒、或小中见大，利用寓言、比喻等使人主“恍然大悟”。

春秋时，郑国的子皮执掌国政，他见子产聪明有才干，便要把政权交给他。子产推辞说：“我们国家小而与大国很近；我们家族大而受宠的人很多，恐怕我不能胜任。”子皮说：“我率领他们服从您，别人谁敢不听？您尽管放心辅助国政。如果小国能和大国处理好关系，其形势也会得到缓和。”子产听子皮这样说，便答应了。

子皮手下有个家臣叫尹何，这个人对于子皮很顺从，子皮很喜欢他。有一次，子皮对子产说：“我想让尹何治理我的封邑，怎么样？”

子产说：“这个人太年轻，不懂得治理国家，恐怕不行。”

子皮说：“这个人办事小心谨慎，又很听话，我很喜欢他，他也不会背叛我。让他学学，他也就知道怎样治理了。”

子产摇摇头，说：“这不行。别人喜欢一个人，总想着如何对他有利；您喜欢一个人，却让他伤害自己。尹何不会治理，您却把政事交给他办，就好像一个人不会用刀子，您偏让他去割肉，到头来只能伤着自己。有谁还敢求得您这样的喜欢？”

子皮听了，默然不语，他在细细地品味着子产的话。子产见子皮默不作声，以为他不高兴了，就说：“您是郑国的栋梁，栋梁一折，椽子离散，我将被压在底下，因此，怎敢不对您讲真心话？”

子皮听了，连声说：“请讲，请讲。”

子产问：“您有了漂亮的绸缎，舍得让不会做衣服的人去练手吗？”

子皮说：“当然舍不得。”

“对呀！”子产说：“衣服是蔽体的，而封邑是庇护身家性命的，它的价值比漂亮的彩绸不知贵重多少。您怎么舍得让不懂治理的人去练手呢？我听说学习以后才做官，没听说把做官作为学习手段的。如果硬要如此，一定要受到伤害。譬如打猎吧，只有会射箭，会驾车的人才能获得猎物。如果让不会射箭，不会驾车的人去打猎，他一上车，一心想着如何不翻车，不被压在底下，哪还有精力去管猎物呢？”

子皮听了这番话，连声赞叹说：“好呀！好呀！我真是个糊涂人。我听说君子所虑大而远，小人所虑小而近。我真谈不上是君子。我只知蔽体衣服的珍贵，从而谨慎待之，不知护身封地的价值，从而轻而视之。从前我认为，您治理郑国，我治理家族，就可以国强家旺，现在看来，家族的事也少不了您的参与。”

通过这件事，子皮更加认为子产忠诚可靠，便把政事完全托付给他了。

#### 【简评】

通俗中蕴含深长之意，劝谏里充满恭维之辞，道理的浅显使国君易于接受，巧妙的恭维又让国君感觉舒服，旧时的诛臣，想要达到劝服的目的，委实不易。

如果直言谏诤，过于“逆耳”，难免会造成听者的反感和抵触，虽是“忠言”，恐怕也难免不产生思想上的碰撞。

子产劝谏子皮，不搞空洞说教，而是借用生动的比喻，寓理于情，使其茅塞顿开，从而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因此，让我们尽量地将“逆耳”的“忠言”变成顺耳的“忠言”吧，在说理的同时，要设法以情打动人，如果双方的心理距离被拉近，还有什么不能沟通的呢？

## 巧借物价省刑罚

当今社会，法制越来越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将物价与处罚联系起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比如说，有些不法商人，高抬物价，牟取暴利，有关部门就可依据反暴利法对其进行处罚。

古代社会，没有健全的法制。在这种情况下，物价与刑罚实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然而却有聪明人将二者联系起来，借论物价之名，规劝君主不要滥施刑罚。

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在位)时，相国晏子衣着简朴，住宅简陋。齐景公知道后，打算更换晏子的住宅，便对晏子说：“您的住宅靠近集市，不仅声音嘈杂，尘土飞扬，而且地势低洼，狭窄潮湿，实在不能居住，请您搬到宽敞明亮、干燥宜人的地方去住。”晏子听了，表示拒绝，对齐景公说道：“这所房屋对我来说已经很奢侈了，况且齐国的先代贤臣也是居住在这里，我还嫌自己的资格够不上继承这所房屋呢！我住在靠近集市的地方，买东西很方便，怎么敢再麻烦百姓为我另建房屋呢？”

齐景公笑着问道：“您的住宅靠近集市，您知道东西的贵贱吗？”晏子回答说：“怎么能不知道呢？”齐景公说：“那么，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呢？”

晏子本来对景公滥用刑罚，致使很多犯人被砍断脚的状况很不满意，知道市场上卖假肢的逐渐增多，又见景公问自己集市上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灵机一动，便乘机回答景

公说：“集市上假肢贵，鞋子便宜”。以此来劝谏景公不要滥用刑罚，要推行仁政。

齐景公听了，脸色变得严肃起来，顿时明白了晏子的用意，从此减轻了对犯人的刑罚，受到了百姓的欢迎。

### 【简评】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刑法严酷，百姓动不动就被砍去双脚，这就是所谓的“刖刑”。齐国的刑罚不仅“酷”，而且“滥”，许多人被砍掉双脚，这对国家是十分有害的。第一，这样做会招致越来越多百姓的不满。第二，会给国家造成越来越多的残疾人，从而增加了国家负担。第三，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残疾人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卫国御敌，从而削弱了国家的防御能力。

这样明显的道理，齐景公却不明白，齐国百姓被砍去双脚的人与日俱增就是证据。

这样明显的道理，明白人却不敢直说，晏子只有在话题赶到这儿才借物价劝齐景公省刑，这就是证据。

如果齐景公不问晏子市场工何物贵，何物贱，如果晏子不是机智敏锐之人，齐国被砍去双脚人的数量，是不是还会继续上涨呢？

## 正话反说

正话正说，是大家都容易接受的，而正话反说呢？难道就起不到劝说的作用吗？

其实不然。言语表现的技巧是千变万化的，使用哪种技巧应该因人、因事、因环境而定，只要符合逻辑规律尽可随意变换花样。

正话反说有时比正话正说更有力，更能达到说服他人的目的。不信，请看下例！

公元前537年，晋国的韩起、叔向出使楚国。当时，楚国和晋国时和时战，积怨很深。即使有外交往来，也是明争暗斗。

韩起、叔向一行到达楚国后，楚王召集大臣，对他们说：“晋国是我们的仇敌，我时时想着灭其威风。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实现，我们何必要考虑其他的事呢？现在，晋国派来的人，都是上卿，上大夫之类的要人，如果我让韩起为我看大门，让叔向为我管理宫室，这样就吧晋国羞辱了。行吗？”

众大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

大夫苏启强站出来说：“完全可以。如果有防备，为什么不可以呢？羞辱一个普通人，都需要防备他报复，何况羞辱一个国家呢？因为羞辱别人有被报复的危险，所以圣明之王都致力于推行礼仪，不想羞辱别人。例如朝觐聘问时持珪，宴会进见用璋，接见别人不歪靠凭几，吃饭时杯中酒满而不饮，宴请时要增加菜肴，还要备表示友好的礼品，使者入境时要派人到郊外迎接，离开时要馈赠物品，这些都是极高的礼仪形式。如果不讲礼仪，那就得有所防备，我们和晋国在城濮大战，晋国得胜而没有防备楚国，因此他们就在邲地打了败仗。楚国因为邲地大胜没有防备晋国，因此才有了鄢陵的失败。自从鄢陵之战以后，晋国就没有丧失防备，而且对楚国彬彬有礼，以和睦为重，因此楚国不能施行报复，只能讲究和好。现在人家与我们和好，而我们却想羞辱他们，怎能不加防备呢？晋国对我们够友好的，要求他来就来，要求婚姻他们就进奉女子，并派上卿上大夫到我国。如果还要对其加以羞辱，恐怕您真得要加以防备了。韩起的手下能人很多，像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叔向的手下也人才济济，像祁午、张超、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跖、苗贲皇都是有勇有谋，晋国人如果失掉韩起、叔向，定会用他们的愤怒加武勇来报复，以洗刷他们的奇耻大辱。君王要羞辱晋国，把亲善变成怨恨，以违背礼仪招致敌人，而又没有应有的防备，让下臣们以卵击石，前去送命，以满足您的心意，这有什么不行的呢？”

一番话说得楚王满面羞愧，他连说：“是我错了，请不要再说了。”

### 【简评】

这是巧妙劝服国君的一个典型事例。在口才学中，常常运用“归谬法”。就是将对方的主张按照他的意向发展，推导出极为荒谬的结果，从而使对方不得不自己承认错误，改变原有的态度。苏启强的一席话，虽然找不出一个不字，但其反对的态度是不言自明的。楚王也终被说服，不再坚持错误的做法。

## 秦襄王绝爱民之道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处在大动荡、大改组时期，地主阶级开始取代奴隶主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各种政治学说、哲学思想也纷纷出笼，形成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

其中儒、法两家的争论最为激烈，并成为不同诸侯国的立国之本。韩非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创造了以法、术、势为中心的法家学说体系，为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强调君主应实行法制而不讲究仁爱，反映出了地主阶级的治民本质。下面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注解。

战国时期，秦国崇信刑法，治民以威猛为事，而不讲仁爱。

有一次，秦襄王病了，百姓听说后，有人祈祷神灵让襄王早些恢复健康。当他们知道秦襄王病愈后，便杀牛祭祀，感谢神灵保佑。秦国的郎中阎遏、公孙衍外出，见百姓杀牛祭祀，非常奇怪，就问：“现在既不是社日，也不是腊日，你们杀牛祭祀何神？”

百姓们说：“听说国君病了，我们为之祈祷神灵，如今国君病好了，我们杀牛感谢神灵保佑。”

阎遏、公孙衍听说后，赶紧回到宫里，向秦襄王道贺，说：“恭喜大王在国中德行超过古代贤君尧舜了。”

秦襄王不解，问：“此话何意？”

阎遏、公孙衍说：“尧、舜之时，未听说有百姓为他的健康而祈祷。如今，您有病而百姓为您祈祷，您病愈百姓为之杀牛祭祀，感谢神灵。所以，我们认为您的功德高于尧舜。”

秦襄王听说，便问是什么地方的百姓这么干。当他问明以后，便对那里的地方官及百姓进行了责罚。阎遏、公孙衍见此，吓得不敢多问。

几个月以后，在一次宴会上，阎遏、公孙衍见秦襄王高兴，才敢对他说：“臣前些日子认为大王德超尧舜，并非是阿谀奉承之言，尧舜病，未见民为之祈祷。如今大王有病，民为您杀牛祈祷。可您听说后，不但不喜，反而对百姓进行责罚，这是为什么呢？”

秦襄王说：“你们应该知道这其中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对他们有仁爱之心，而是因为我使用权势让他们服从我。如今他们因我病而为我杀牛祈祷，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以收其心。如果真是这样，一旦我对他们不爱了，他们就会不被我所用了。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

### 【简评】

拿破仑说：君主应有狮子的威严和狐狸的狡猾。一语道出了帝王统治之术的本性。拿破仑非常精通此道。他以特有的“铁腕”建立起庞大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器，以绝对的权威和强硬的立场使整个欧洲为之颤栗，同时他又异常狡黠，凭着权变之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有仁爱之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秦襄王实行霸道，当然不欲使民爱，而妥使民畏。通过权势治民，是封建统治者都奉行的原则。为了其统治的需要，他们有时会打出仁义、爱民的旗帜，不过是在权势的宝座周围